

吳
光著

黃宗義著作參考

國學研究叢書

臺灣學生書局 印行

吳光著

黃宗羲著作彙考

臺灣學生書局印行

黃宗羲著作彙考 / 吳光著 -- 初版 -- 臺北市：臺灣學生，民 79
12,323 面；21 公分 -- (國學研究叢書；5)
ISBN 957-15-0099-2 (精裝) -- ISBN 957-15-0100-x (平裝)

1. 著作目錄

017.272

黃宗羲著作彙考(全一冊)

著者：吳

出版者：臺

灣學生書局

發行人：丁

灣學文書局

發行所：臺

灣學文書局

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一九八號

郵政劃撥帳號：〇〇二四六八號

電話：三三六三三六四三三五四六

FAX：三三六三三六四三三五四六

本書局登記：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一一〇〇號

印刷所：淵明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永和成功路一段四十五號

電話：九二八七一一四

香港總經銷：藝文圖書公司

地址：九龍又一村達之路三十號地下後座

電話：三八〇五八〇七

定價：精裝新臺幣二六〇元
平裝新臺幣二一〇元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五月初版

01104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ISBN 957-15-0099-2 (精裝)
ISBN 957-15-0100-X (平裝)

黃梨洲先生坐像



黃宗羲畫像

(原件現藏浙江餘姚梨洲文獻館)

僕衰病不堪非復向日光景永
委作謚議或誌或表待天和即當
投筆海內老成已盡况於同班兄
弟乎此不容辭耳人行急迫不盡
所言
叔寧老姪
宗義頓首

黃宗義與叔寧老姪（周靖）書真蹟

（原載清海鹽吳修彙編《昭代名人尺牘》卷一）

吳著《黃宗義著作彙考》序

一九八六年十月，我去寧波參加「國際黃宗義學術討論會」，才初次見到吳光君。他是會議的秘書長，事務極為繁忙，但還是找到時間交換了彼此對於黃宗義以及其他有關學術問題的意見。

說起來，我和浙江是特別有緣的。一九七八年，我第一次由美國回去探親，那時「文革」過了不久，學府還沒對外開放，哲學又是一個特別敏感的題目，不可能進行正常的學術交流工作。一九八一年，在杭州召開「宋明理學國際學術討論會」，第一次邀請海外學者參加。這是一個重大的突破，我滿懷興奮去參加了這次歷史性的會議。可是那時吳光君不在杭州，所以沒有見到面。此後五年內，我沒有再回大陸。我的原則是祇參加與我本行的研究工作直接有關的學術會議。沒想到再回去又是到浙江，而這時吳光君已是浙江省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所長。他和我通信連絡，邀請我去開會，我自欣然允諾。我十分感謝浙江古籍出版社寄贈黃宗義全集第一冊給我。在一九八六年的上半年，我由香港中文大學休假，到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作了半年研究。本來是要做周易研究，但在飛機上看了與黃宗義有關的資料，即思潮澎湃，不能自己，乃先着手寫黃宗義心學的定位一書（本書已由允晨出版公司出版）。我去寧波開會所提交

的論文即是此書之綱領。在新加坡時，同事陳俊民教授就常常稱道吳光君在學術方面的潛質與造詣。我看到黃宗義全集的前兩冊，知道實際的編纂工作多由吳光君負責，每冊後面的考據文章也都出於吳君手筆，更加深了我對他的印象。而現在吳君也到東亞哲學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了。

大陸自「文革」以後，不再對純學術的研究工作橫加干預。學者們對資料的掌握與發掘，乃有了長足的進展。吳光君勤於搜集有關黃宗義的資料，親身去南北各大圖書館蒐求，果然有了新的突破。先是發現了留書中爲人未見的篇章，後來又找到黃宗義南雷雜著的手稿，其中有黃宗義的一封信，據吳君的考證，是寫給徐乾學的信。由於該信內容牽涉到黃宗義晚節的問題，我把吳君的考據和我說明的文章，拿到文星發表（見一九八七年四月號）。這大約是多年來大陸學者的學術文章直接在台灣雜誌上發表的第一篇，對於促進海峽兩岸學術的交流，或者多少有一點開風氣之先的作用罷！

總之，就我個人所知，到目前爲止，關於黃宗義著作的研究材料收集之完備，考證之精詳，實莫過於吳君此書。吳君的考據，本來附錄於黃宗義全集各分冊的後面陸續出版，耗費時日既多，也難於窺其全豹。現經其修改補充，寫成黃宗義著作彙考一書，首先在台灣單行出版。這是很可以令人歡迎的一件事。

對於黃宗義的研究，我自己所着重的是義理的演繹與詮釋，吳君用力最勤則在材料的搜集與考據。兩方面的努力都希望把對於黃宗義的研究帶進一個新的境界。故樂爲之序。

劉述先 一九八八年十月九日

梨洲遺著總數考（代序）

黃宗義（公元一六一〇—一六九五年）字太冲，號南雷，別號梨洲老人、梨洲山人、藍水漁人、魚澄洞主、雙瀑院住持、古藏室史臣等等，學者稱黃梨洲先生，浙江餘姚縣黃竹浦人。他是我國明末清初一位偉大的啓蒙主義思想家和史學家，也是一位博學多才的著述大師。

黃宗義一生著述弘富，涉及領域也很廣闊，舉凡經學、史學、文學、曆學、數學、地理學乃至金石、音律等領域，都有著作成果，可惜由于迭遭水火之災、戰亂之劫以及清朝文網的禁錮，致使其中不少著作散佚損毀，今人已經無法搜羅齊全。雖然如此，我們還是可以從現存梨洲遺著實物以及歷代學者的著錄、考證、年譜、傳記中了解梨洲著作的總體情況。在此，先簡略地回顧一下自康熙時代至近年幾種記載較全且有代表性的著錄情況：

一、宗義季子黃百家（公元一六四三—一七〇九年）跟隨父親從事學術活動數十年，比較了解乃父著述情況，所著先遺獻文孝公梨洲府君行略（刊于南雷文定五集附錄）著錄梨洲遺著共計四十六種，但大多未錄卷數，而且種類不全，蓋取其主要者予以著錄之故；

二、康熙時期的歷史學家邵廷采（公元一六四八—一七一一年），與宗義同邑，且親聆梨洲講學，堪稱及門弟子，其所著思復堂文集卷三之遺獻黃文孝先生傳著錄梨洲遺著四十種，且稱

其總數「不下百種」，可見未能盡錄；所錄四十種也未記卷數，雖有黃百家行略缺錄者，但比行略要少幾種；

三、生活在康熙後期至乾隆中期的著名歷史學家全祖望（公元一七〇五—一七五五年）自稱梨洲「私淑」弟子，對梨洲生平事迹及著作情況有較全面的瞭解和考證，所著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見鮚埼亭集卷十一）著錄梨洲遺著六十三種，此外又在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見鮚埼亭集外編卷四十四）中補錄三種，總計六十六種。其中四十種有卷數，計八百九十四卷，其餘則未錄卷數。但祖望將歸屬行朝錄的贛州失事、賜姓始末等七篇單獨著錄，又分宋元儒學案爲宋儒學案、元儒學案兩種，如果加以裁併，則所錄梨洲遺著總數祇有五十八種，仍然未能盡錄；

四、宗義七世孫黃炳垕（公元一八一五—一八九三年）于同治十二年撰成黃梨洲先生年譜三卷，著錄梨洲遺著較以往更加詳細，共計有七十四種（其中行朝錄九篇單獨著錄），約計一千二百餘卷，雖有遺漏，然尚無妄作增添者。炳垕又著黃氏世德傳贊黃宗義傳（有光緒十六年刻本）著錄梨洲遺著五十八種，約九百餘卷，較年譜條理更加清楚。

五、近代學者、梨洲後裔黃嗣艾著有南雷學案（民國二十五年南京正中書局出版），其遺著目錄梨洲遺著七十七種，一千三十一卷。雖比以往更多，然考辨未精，真偽未辨，訛誤較多。如將瀆考、鄭成功傳、張玄著先生事略、玄珠密語等誤作梨洲遺著，又謂黃氏宗譜有三十六卷云云，皆係誤錄，致使後人沿襲其錯誤，出現不少混淆。

六、當代歷史學家謝國楨始撰於三十年代而修訂於五十年代的黃梨洲學譜（上海商務印書

館一九三二年初版，一九五七年修訂版），其著述考一節著錄梨洲遺著六十四種，一千二百餘卷，雖然未錄其全，也存在某些錯誤（如有關行朝錄、滇考即有誤記），但其考證嚴謹而求實，頗多前人未發之見，其貢獻不亞於全祖望、黃炳垕二人。

七、南京大學教授洪煥椿在四十年代曾任職於浙江圖書館，對浙江文獻及梨洲遺著頗加重視，所著浙江文獻叢考（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專立清初歷史學家黃宗羲著述目一節，著錄梨洲遺著一百零五種，總計一千三百餘卷，且多數條目下附有簡略說明，可資參考。但該著所列書目或為某書某集之子篇，或沿襲了黃嗣艾、謝國楨的錯誤而未能明辨，或照錄館藏圖書卡片而未審原書，或僅據封頁題箋而未辨內文，故著錄錯誤較多，不可盲目信從。

除上述諸家著錄之外，尚有江藩國朝漢學師承記、錢林文獻徵存錄、阮元疇人傳、唐鑑清學案小識等書之黃宗羲傳記，以及清代餘姚縣志、竹橋黃氏宗譜、梨洲遺著彙刊之編者序言、目錄中均有比較集中的著錄，但與前述諸家大同小異，並無出其右者，恕不一一贅述。

那麼，梨洲著作總數到底有多少呢？筆者近年受浙江古籍出版社委託，具體負責編輯、整理黃宗羲全集（全十二冊）的組織工作。於是，不得不盡心竭力，奔走於南北圖書館，埋首於古今故紙堆，不勝其繁地搜集查核梨洲遺著的各種版本，努力發掘罕為人知，從未刊印的稿本和抄本，反覆核對，辨析前人有關著錄和考證，從而得以比較清楚地瞭解梨洲著作總數及其存佚情況，並對每種遺著的寫作背景、刊行情況、版本優劣等問題作出了自己的考證。儘管我的考證和統計可能仍有誤漏，但較之前人自信更加全面準確。據我所考，梨洲著作總計一百十一

種，一千三百餘卷，不少於兩千萬字。這些「著作」，並非全屬本人撰著，其中十餘種近千卷是由黃宗義主持編選的宋、元、明人著作。如果按著作性質分類，則可分為三類：一是文選彙編類，如明文案、明文海、明史案等，共十九種，約一千卷，二是自撰專著類，如易學象數論、行朝錄、明儒學案等，共六十四種，約三百卷（其中宋元學案按一百卷計，但非全由宗義編著）；三是自著詩文集類，如南雷文案、文定、詩曆等，共二十八種，七十餘卷（其中多數是重複結集，如刪其重出者，則只有四十餘卷）。現在尚存者，有文選十種，八百九十五卷，專著二十六種，二百九卷，詩文集十八種，六十七卷（其中有重複計算者，詳見本書南雷詩文集考）總計尚存五十四種，一千一百七十卷，其中屬於宗義本人撰著的僅存四十四種，二百餘卷。其他都已亡佚難尋了。

如前所述，前人有關梨洲著作的著錄和考辨，存在不少遺漏或錯誤，有必要澄清事實，考定真偽；有的梨洲著作的寫作背景、年代及刊行情況，前人或者語焉不詳，或者未作交代，也需加以考定和判別；已經刊印的梨洲著作，各種版本精粗不一，需要辨其優劣；各種題名黃宗義撰、編的未刊稿本和抄本（包括近年新發現者），或為前人所未考未見，或有偽作夾雜其間，也需作出鑒別和考證。筆者不辭淺陋，自一九八四年至今，費數年之力，陸續撰成三十餘篇考證文章，其中有的已收入黃宗義全集作為附錄出版，有的發表於學術刊物，而大多尚未發表。今年五月，筆者應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之聘，携眷抵新，出任專任研究員之職，研究課題之一即編撰黃宗義年譜。於是將黃宗義遺著考各篇初稿略事修訂，增補數篇，彙為一帙，題名黃

宗義著作彙考，擬付出版。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主任劉述先教授鼎力支持，惠賜大序；又蒙臺灣學生書局慨然接受出版，亦此書之大幸也。我與述先教授交往，始於一九八六年春，而正式見面，却在該年十月舉行的寧波「國際黃宗義學術討論會」上。當時，他在寫黃宗義心學的定位一書（現已出版），而我在編黃宗義全集及做梨洲遺著的考證，所以彼此有很多共同語言，頗有相見恨晚之感。而我對劉先生的道德文章，亦早有聞見，可謂「心嚮往之」了。今請先生爲拙著作序，乃出於一片誠敬之心，非一般泛泛之交所可比也。

還應向讀者鄭重說明的是：梨洲遺著多又散，前人著錄徧而亂，本人學力單薄，識見有限，故筆者以往所作考論中有關梨洲遺著的統計、歸類、存佚諸見解，不免有與本書不合之處，謹以是編爲準。且書海茫茫，考證艱難，前此之誤，已有本書正之；本書之正誤補闕，尙待未來。伏乞讀者指正幸！

吳 光

謹識

一九八八年十月十六日於新加坡東亞哲學研究所

黃宗羲著作彙考 目錄

劉序.....一

自序.....三

一 明夷待訪錄與留書合考.....一

二 明儒學案考.....一一

三 宋元學案補考.....二九

四 易學象數論考.....五九

五 破邪論考.....六三

六 深衣考與黃氏喪服制合考.....六五

七 葬制或問與梨洲末命合考.....六九

八 孟子師說考.....七一

九 子劉子行狀考.....七三

十 汰存錄考.....七五

十一	思舊錄考……………	七九
十二	黃氏家錄考……………	八五
十三	弘光實錄鈔考……………	八九
十四	行朝錄考……………	九三
十五	海外慟哭記考……………	一一五
十六	西臺慟哭記註與冬青樹引註合考……………	一一七
十七	金石要例考……………	一二一
十八	歷代甲子考考……………	一二三
十九	四明山志考……………	一二五
二十	匡廬遊錄考……………	一二九
廿一	今水經考……………	一三一
廿二	梨洲曆算著作合考……………	一三三
廿三	南雷文集考……………	一四七
廿四	南雷詩集考……………	一六七
廿五	南雷詩文合集考……………	一七五
廿六	南雷集外詩文考……………	一八一
廿七	明文案考……………	一九三

廿八	明文海考·····	二一一
廿九	明文授讀考·····	二一九
三十	梨洲編選前人詩文集合考·····	二二三
卅一	梨洲散佚著作補考·····	二四五
附錄一	：黃宗羲著作總目表·····	二六五
附錄二	：清初啓蒙思想家黃宗羲傳·····	二七三

一 明夷待訪錄與留書合考

衆所周知，黃宗羲在抗清鬥爭失敗以後，寫下了一部膾炙人口的政治思想代表作——明夷待訪錄。書中破天荒第一次提出了「爲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的歷史名言，把思想批判的矛頭對準了兩千多年來的中國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並提出了「天下爲主，君爲客」、「君與臣，共曳木之人也」以及「人各得自私，各得自利」、「公其非是於學校」、「工商皆本」等思想主張，從而奠定了黃宗羲作爲一位具有民主傾向的啓蒙思想家的歷史地位。

然而，過去一般人所了解的明夷待訪錄，是一卷二十一篇刊印本。而乾隆時代的著名學者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中說：「先生所著，有明夷待訪錄二卷，留書一卷。」（鮑琦亭集卷十一）又在爲鄭氏二老閣刻本寫的明夷待訪錄跋中說：「明夷待訪錄一卷，……原本不此於此，以多嫌諱弗盡出。今並已刻之版亦毀於火。」那麼，明夷待訪錄原本究竟是一卷還是二卷？它寫成於何時？刊刻於何時？它與留書的關係怎樣？那些「嫌諱弗盡出」的內容是什麼？這些問題，在我們整理黃宗羲全集並在一九八五年重新發現留書之前，在學術界一直是個謎。

一九八三年秋，我因編輯黃宗羲全集目錄的需要而到寧波天一閣訪書，從其所藏馮貞羣

（字孟顥，爲近代浙東著名藏書家，所藏古籍在「文革」時代由其遺屬移交天一閣）伏跂室書目中查

知有留書一卷五篇抄本尚存該館，即向「天一閣文物保管所」管理員駱某借閱，但駱說「此書有目無書」，不肯借閱。其後，我又兩訪天一閣借閱留書，但駱氏均以「未見此書」謝絕。直到一九八五年三月，我從北京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善本室所藏南雷文鈔鄭祐抄本中發現了留書中的文質、封建兩篇佚文以後，於同年八月再次到天一閣會見駱氏時，駱才說「最近我們也找到了留書抄本」，並將原本借我校閱。其後，駱在鈔錄留書副本寄我「指正」時，又另抄一本交文獻雜誌發表，並自稱「發現了失傳三百年的留書」。其實，留書並未「失傳」，早由二老閣主人鈔錄於前，馮貞羣先生收藏於後。而且這次也非首次「發現」，因為謝國楨先生於一九五七年春至寧波訪書時，馮貞羣親將留書抄本出示，謝氏又在黃梨洲學譜（商務印書館一九五七年修訂本）中作了著錄和補充說明，祇是當時沒有受到學者足夠重視而已。但不管怎樣，這次重新發現留書是件好事，它使我們得以解開了明夷待訪錄從初稿到刊刻流傳之謎，弄清了留書和明夷待訪錄之間的密切聯繫。

原來，明夷待訪錄從寫作初稿到修改定稿乃至刻印流行，經歷了一個不平凡的過程，其大致情況如下：

在清順治二年（公元一六四五年）六月，清軍消滅南明弘光政權後挺進浙東，前明官員錢肅樂、孫嘉績、熊汝霖等在寧波、餘姚等地組織了浙東抗清武裝，迎立明宗室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建立了監國魯王政權。黃宗羲在家鄉組織黃竹浦子弟六百餘人爲「世忠營」，追隨孫、熊等人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抗清鬥爭。但時過八年，即順治十年（一六五三年）癸巳歲三月，魯王被迫取